

（二〇一五年五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毛泽东的“削藩”	
	——简论 1973 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丁凯文
【往事非烟】	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	李永晖
【书刊评论】	评《王力反思录》	阎长贵·王广宇
【劫后反思】	无法抚慰的岁月	张抗抗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毛泽东的“削藩”——简论 1973 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 丁凯文 ·

1973 年底，毛泽东着手实施了军队系统内部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不仅是文革期间中共进行的一次军队系统大军区司令员的重大调整，也是中共自 1949 年建政以来进行的唯一一次如此重大的调整。为何此时的毛泽东要对军队系统作如此重大的调整？以往的官史对此未作详细的解释。201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及同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仅仅对此事作了极为简短的叙述。2003 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对此有较为含蓄的说法：“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1〕笔者则认为，毛泽东搞的这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真实意图在于“削藩”，打散、消弭军内隐然形成的对文革极左派的掣肘力量，以保证军队的效忠和文革大业在其生前和身后的延续性。

一、林彪事件后军内系统的重新洗牌

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的林彪与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突然出走，随后不久，他们所乘的 256 号三叉戟专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一突发事件使毛泽东措手不及，对于如何加强对军队的掌控，毛泽东想到了叶剑英。“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剑英，要求叶剑英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这显然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以叶剑英制约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等人的重要部署。周恩来指定叶剑英负责处理林彪事件的善后事宜及战备事项，并让叶剑英转移到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待命应变。〔2〕9 月 24 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10 月 3 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成员有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

毛泽东自井冈山斗争起家之后，在军中最为信任和依赖的主要是三个人：彭德怀、林彪、叶剑英。中共建国后，毛泽东也主要是依靠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为其主持军队的日常工作。彭德怀和林彪相继倒台后，毛泽东将负责军队事务的大权交给叶剑英执掌，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在1971年11月14日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讲话时，特别提及叶剑英。毛称：“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3〕这是毛泽东首次变相地为叶剑英“二月逆流”作了平反，将当初叶剑英等人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抗争歪曲为与林彪的斗争。由于林彪的意外倒台，叶剑英被毛泽东冷落多时在晚年有机会再次被毛启用，重新开始了中央和军队高层的政治生活。

在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对军队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第一，清洗军队系统中被认为是林彪一系的人马。9月24日，负责军委办事组的四员大将：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被周恩来宣布停职审查，随即分别关押在北京市卫戍区。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对总参、总政、总后、空军、海军、各大军区等分别采取措施全面清洗林彪系统的人马：如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解放军总政副主任黄志勇、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总后副部长王希克、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韦统泰等等，一大批军队干部遭到清洗。

第二，清算林彪历史上的“罪行”，肃清林彪在军中的影响。文革中林彪被誉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更被树立为毛的接班人，还被写进了中共九大的党章。为了消除林彪的影响，毛泽东在军中开展对林彪的批判，尤其是那些曾经与林彪长期共事的老师更要带头表态批林。197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的批林整风文件，印发了一批老师们的揭发材料，如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萧克等人的书面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历史上给林彪罗织“罪名”。军中大老们出面对林彪的揭发批判，大都是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基本上是张大其辞，无中生有的歪曲史实，但是这些批判内容出自军内元老，因此对批林一事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第三，毛泽东文过饰非，嫁祸于人，将军内老干部文革中受到的打击统统归罪于林彪。除了在1971年11月给叶剑英的“二月逆流”一事平反外，毛泽东还将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政委廖汉生的倒台归于林彪的诬陷。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借着出席陈毅追悼会的机会宣称陈毅是个好人，如果林彪上台会搞掉这些老干部。不仅如此，毛还“不经意”间提及邓小平，把邓列为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通过出席陈毅追悼会向外界释放出一个信息，即那些党内老干部，特别是军队里的许多干部还是好的，是拥护毛的，他们在文革中虽然受到冲击，但是还要看到他们的主流，对于他们还要一分为二。至于他们文革中遭受的不幸，那都是林彪搞阴谋的产物。毛泽东利用这一机会作出了姿态，目的在于收拢人心，安抚一下文革中这些受苦受难的党内军内元老。

第四，一批党内、军内的元老得到解放。林彪事件后由于军队一大批干部受到牵连，不少人被审查、批判、靠边站或者倒台，军队系统由此出现了真空。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毛泽东不得不解放一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军队干部稳定局势。1972年春起，毛泽东相继就一些党内、军内干部和家属的申诉作了批示，如原海军政委苏振华、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等。1972年

底，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召集了中央有关会议，宣布开始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军以上干部的政策。周恩来还规定，被解放的干部的审查报告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关于军队的干部，周恩来直接与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和总干部部长魏伯亭商议。经过一番艰难的周折，最后有175位解放军将领得到“解放”，重返了工作岗位，如萧华、杨成武、苏振华、梁必业、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李成芳、吴克华、王建安、杨勇、廖汉生、乌兰夫、刘震、刘志坚、余立金、黄新廷、莫文骅、郭鹏、杜义德、郭化若、傅崇碧、王尚荣、颜金生等人。

经过这一轮的军内洗牌，林彪系统的骨干人马基本上被清除殆尽。然而，毛泽东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作为自己嫡系的林彪及其将领们被清除了，而重新起用的这一大批文革中被冲击和打倒的军队将领们在咸鱼翻身后真的会拥护毛泽东的文革大业吗？此外，军人在文革中由于“三支两军”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亦是毛泽东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毛泽东自林彪事件后曾重病一场，此时的毛必须要考虑自己身后文革大业的持久性和永续性，而掌控好军队是各项的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这大约可看成是毛泽东实施“削藩”的远因吧。

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近因

笔者认为，毛泽东实施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近因源自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三位大军区司令员的信件风波。这其中包括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该信件的原委。

林彪在1970年8月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点了一把烧向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火，引起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共鸣，全会上掀起了批判张春桥的高潮。8月26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信里提了四条意见：一是犯错误的人必须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检讨请罪；二是，犯错误的人不能参加中央工作，下放到基层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三是，这些人也不能参加人大常委；四是，对错误思想要进行批判。韩先楚和杨得志看过此信后也表态支持，分别写了类似的信。当时这三封信由处理大会会务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转给了周恩来。（4）

但是，此时庐山会议的风向已经转变，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会议开始转为批判陈伯达。周恩来此时不愿这三位司令员卷进去遭殃。周再三思考后将此三封信转给叶群，并附了条子说“到此为止，存你处”。事后叶群对吴法宪、邱会作说：“我捡到三个险球，你们要守口如瓶，我一定要保住三个司令。”（5）据邱会作回忆：“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个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写的信，是周总理交给叶群，叶群让吴法宪、李作鹏和我看了。叶群有一次同吴、李、邱三个说：‘这三封信是周总理转过来的，并交代信就放在我这里，不要再转手了。’叶群又说：‘这是三个险球，如果落在‘最高’手里，特别是落在江青手里，还不知道要起什么风波呢？’”（6）因此许世友等人的三封信并未转给毛泽东，而在毛家湾的林办压了下来。

然而，在1972年初，江青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参加了中央对山东有关问题的处理，江青在会上获得了一条重要的消息。这条消息来自山东省内部反映的一个情况，即在庐山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省领导向中央写信，建议处理当时在庐山犯错误的人。江青从解决山东问题的会上获悉有人写信提到“犯错误的人”的消息后，便马上寻找了那几封信。信件涉及到周恩来、王良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等人。江青对此批示道：“这几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态信！”与此同时，江青找到毛泽东大吐苦水：“他们整我的材料，封闭我，我是林彪专案组成员，但情况不告诉我，材料不报给我，还在背后搞黑材料。”“主席啊！我是受林彪迫害的，你知道，林彪是要置我于死地！”“总理也参与这件事。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

志那些人，合伙给林彪政变写的效忠信，要整我、整春桥，总理转送的。但在清查中他把转给林彪的效忠信压下了，你都不知道。”毛泽东对此表示了不悦。毛说：“许世友、韩先楚是大老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我过去就说过，他（许）只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线……”有了毛泽东的表态，江青马上找来张春桥秘密商议。很快，她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追查几位老将给林彪写效忠信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在她的吵闹之下，决定派代表与老将们谈话，先弄清情况。接着，她又给中办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一定要彻查这几封信是如何到林彪那里去的！”〔7〕

1972年底，中央发出通知，要求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三位大军区司令员和有关领导分批进京。他们在指定的宾馆一住下，就有中央派来的代表找他们谈话。这些谈话，主要按照中央确定的口径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信上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第二，信为什么会跑到林彪的手里？第三，为什么三个大军区司令员信的内容大致相同？庐山会议以后，张春桥成为反林彪的“英雄”，是毛泽东的红人，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如果许世友等人的信是针对张春桥，那就属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分裂党中央。如果此信有意写给林彪，拥护林彪在庐山批张的讲话，就是上了贼船，起码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如果许、韩、杨三人搞了“串联”，就是非组织活动，为党的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王洪文是负责谈话的中央代表之一，同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的谈话主要针对“你们有责任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据了解，为写信碰过头的大军区领导还有好几个，中央对此事清楚，主要看你们的态度！”由于压力太大，许世友身体不好住进了301医院，在京七天，却有五天住院。〔8〕12月31日晚许世友在中央的同意下回南京休养。

许世友、杨得志和韩先楚所面临的局面异常严峻，压力极大，弄得不好就可能步上黄吴李邱的后尘。许世友在京这几天不仅交代秘书李文卿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别人，甚至还让李回南京后赶紧下部队，远离政治漩涡。许世友对李文卿说：“你还是出去工作吧，免得连累你。斗争复杂，有忠无奸不成戏，这是老话。”〔9〕实际上许世友此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由于中央未查出三位将军串联写信的证据，杨得志和韩先楚二人先行解脱了。5月初，毛泽东特别请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和韩先楚一起到南京做许世友的工作，做通了许世友等人的思想工作。1973年5月14日，许世友以个人名义写了给毛泽东的检讨信，检讨信的主旨是，许世友与林彪仅仅是工作上的一般关系，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属上当受骗，由许世友个人承担责任。5月17日，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许世友与会并将检讨信交与李德生转呈毛泽东。韩先楚的检讨信印发给政治局，许世友的检讨却没有音讯。〔10〕

5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韩先楚时曾说：“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所谓“以《国际歌》为界”是说，以毛泽东的南巡为界，那时的毛南巡谈话，每到一处就要军政大员们一起唱《国际歌》，目的就是要各路“诸侯”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倒林的战略部署上来。据纪登奎事后的回忆，毛泽东发了话，毛说：不要再追究了，许世友是个粗人，你们不要指望他会像你们那么细致。林彪已死，只要这些人搞不起来，就不要打击面过宽了。〔11〕实际上，毛泽东放了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人一马。到此为止，许世友等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自林彪事件后，军队里已经进行了大清洗，如果再将这几位上将也一并打为林彪死党予以清洗，显然不利于军队稳定的大局。但如果以为毛泽东就此罢休了也是过于乐观，仅仅过了半年，毛泽东就搞了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都被调离原有的地盘，其军内的势力也就大大削弱了。

三、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过程

经过一番思考，毛泽东终于对军队人事出手了。1973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话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之所以要搞这样的调动，毛泽东给出了一个理由：“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毛还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12〕

为了实施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毛泽东多次找政治局委员们谈话。12月13日，毛说：“你们议了些什么，行得通吗？”“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12月14日，毛再次找政治局委员们谈话，谈话中不仅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还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太好了。调动也有问题。”〔1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在15日开会，商定了中央军委会议出席者的名单，并研究决定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一律不兼职。当天，毛泽东又同政治局有关成员、北京军区领导人、以及沈阳、济南、武汉军区领导人谈话。此后几天，政治局成员按照分工同各大军区负责人分别就对调一事谈话。17日，各大军区负责人全部到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分别同他们谈话。当晚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谈话报情况汇报。18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并通报了几天来政治局成员分别做工作的情况。12月19日和20日，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对调问题的具体实施。〔14〕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央军委会议成员，共43人。毛泽东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15〕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的命令。该命令说：“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即，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为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任为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调任为南京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调任为济南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调任为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为兰州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没有调动。

毛泽东要求军委的调动命令下达后，各军区司令员在10天之内到任新职，每人只能带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许世友当时只带了自己的秘书、医生和管理员赴广州军区任职。12月26日，李德生由纪登奎、吴德陪同飞赴沈阳。同一天，杨得志从济南飞往武汉任职。其他各大军区司令员也都在年底前分赴各地任职。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到此告一段落。

毛泽东此时为何要实施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以往官方史书对此皆语焉不详。自从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患重病，身体状况已经大大下降。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他的身后中国

政坛的走向，并及时作出安排，而如何处理好军人从政的问题则是重点问题之一。1973年7月间，毛泽东通过姚文元找了上海市委写作组重印《史记》中一些人物传记，其中包括《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灌婴列传》、《鲸布列传》和《陆贾列传》。（16）这几位汉朝人物都曾经是汉高祖刘邦的功臣宿将，除鲸布一人因“谋反”在刘邦生前被剿除外，其他几人都是刘邦身后安邦定国的人物，极具代表意义。毛泽东熟读史书，要参考这些历史典故，从中寻求解决之道。

前述“三位上将信件风波”对毛泽东触动很大，虽然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都作了检讨，毛泽东也发了话“以《国际歌》为界”，不再继续追究这三位将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彻底放心了，这几位将军在军界有相当的实力和地位，毛泽东在世时不会生事，但是毛去世后他们是否会站在文革极左派一边却是一个大问题，这也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毛泽东名义上搞的是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但是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却没有调动，许世友、杨得志和韩先楚这三个“问题人物”不得不离开自己原有的地盘，孤家寡人的到另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地方任职。

此外，中共召开十大时，毛泽东提议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为副主席，但是许世友却表示，中央副主席只要周恩来一人即可，或者只要三个老同志。（17）也就是说，许世友反对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许世友的反对自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执意扶植王洪文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面对军界的不同声音，还是要有所考虑。毛最后又从军队当中选了李德生任中央副主席，也算是搞了平衡。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虽然顺利“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毫无中央工作经验，被军中讥讽为“儿童团”，根本无法驾驭军内的“骄兵悍将”，毛泽东看到问题的症结，如何解决则是一个大问题。最终，毛泽东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和平的方式“削藩”，将这些大军区司令员调离原工作岗位，且只调司令员，不调换政委，他们新的地方也不再兼任地方党政一把手，将这些人调离他们经营多年的地盘，打散其势力，使之不再构成对文革极左派的威胁，这就基本上解决了“藩镇割据”、“拥兵自重”的局面。

1974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组成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六人小组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中央军委名义开展工作。（18）从这个六人小组的组成来看，文革极左派的王洪文和张春桥仅排叶剑英之后，在军中有了一席之地。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刻意扶植文革极左派逐步实现对军权的掌控。

四、调开李德生的另一番深意

李德生是中共十大当选的党中央副主席，兼总政主任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毛泽东此时为何要将李德生调去东北地区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笔者认为，毛泽东实施的这次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除了将许世友、杨得志和韩先楚调离原有军队岗位之外，另一层更深的含义是针对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

李德生原本是毛泽东十分中意支持文革运动的军队干部典型。1967年李德生作为解放军12军军长在安徽省支左，得到毛的好评，1968年李出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李德生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出任解放军总政主任。李德生并非林彪派系人马，但是李平日谨言慎行，与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与军委办事组的关系尚可。1971年的批陈整风期间，李德生被毛泽东当作一枚棋子，“挖墙脚”而取代郑维山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来在“913事件”期间代表周恩来坐镇空军，直接处理林彪专机外逃的事件。日后李更参与中央专案组处理林彪专案的审查工作。故李德

生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毛泽东的信用，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李德生成为党中央副主席，跃上了人生的顶峰。显然，此时的李德生也是被毛泽东当成接班人之一来培养和重用的。

为何刚刚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内就被调出北京到沈阳任职？李德生自己回忆说：“特别是党的十大之后，江青等人对我当选为党的副主席，而她并未进入常委，极为不满和记恨，……而对我工作中的无理干预，故意刁难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斗争越来越公开化，直至在批林批孔中，江青‘放火烧荒’，公开点名批判我，提出‘打倒大军阀’，逼我承认上‘林彪贼船’，着着都欲置我于绝境。”

（19）李德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而非认识到更深层次的原因。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披露了其中的原委。王洪文说：到了党的“十大”的时候，毛主席把李德生提升为党中央副主席，这就对张春桥的提升和我（王）的使用有了影响，成了新的障碍，是潜在的威胁。那时我们就把李德生和林彪的关系摆在毛主席面前，要搬开他。毛主席认为李德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军高级干部中能冲破束缚，最早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造反的人，有代表性。毛主席给了李德生一个面子，让他自己辞职，把他放到了东北。那里有毛远新他们，李德生“有职无权”，不怕他搞什么事。而李德生被整怕了，顺从地接受了，事情也就平息了。（20）

笔者认为，李德生毕竟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启用的军队支持文革运动的一个典型，且一直予以信用。在毛泽东的眼里，李德生一直以来也无大错，且李并非林彪系统的人马，在扳倒林彪系统时更被毛所重用。文革极左派们虽然强烈要求扳倒李德生，但是毛泽东考虑得更全面和长远，在这种局面下尚不宜打倒李德生，将其换个位子，调到其他地方任职，整体而言利大于弊。据李德生回忆，李德生在沈阳军区也处于十分被动、尴尬的境地，毛远新身为沈阳军区政委就曾组织对李德生的批判。除了军区党委办公室和保卫部的一些人外，大多数人都与李德生保持距离，李不得不经常下基层“蹲点”或读书打发时光。

李德生虽然在1973年底被赶到沈阳，但是他的厄运并未终止。1974年8月26日到9月10日，王洪文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分别“批评帮助”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人。李德生是“重点的重点”。王洪文在会上说：“对于批林批孔中各地揭发的问题，主席（指毛泽东）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这个‘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李德生被追查的问题有：参与林彪的第一个号令，销毁黄吴李邱的黑材料，1970年5月19日林彪接见总政副部长以上干部的问题，纪念军委扩大会议十周年的问题，庐山会议问题，解放军报刊登林彪的照片问题，1971年干部工作会议问题，林立果讲用报告问题，“北兵南调”问题，“913事件”中的直升机外逃问题，“913事件”后“捂盖子”问题，插手总政等。（21）会上王洪文、毛远新给李德生上纲上线，逼得李德生不得不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的“罪行”。9月8日，毛泽东在李德生的检讨上批示：“已阅，改了就好。”

一些论者在谈及“四人帮”和毛远新对李德生的批判、攻击时，都将其归结为这些人的个人行为。包括李德生自己也认为“四人帮”攻击他的目的是“显然要从我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找到攻击周总理、叶副主席的‘炮弹’”。（22）其实，“四人帮”和毛远新的背后就是毛泽东，没有毛的纵容、许可，这些人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围攻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和许世友、韩先楚这些大军区司令员？这与1971年2月张春桥、毛远新等人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围攻、狠批军委办事组如出一辙，惟有造成强大的批判声势和浪潮，才能逼迫被批判者低头检讨，然后即可采取组织措施撤换这些人。这也是毛泽东对待其对手们所采用的一贯手段和策略。

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被任命到地方任职。毛泽东在1973年12月14日与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时说：“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23〕毛泽东一句话就解除了李德生总政主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为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铺平了道路。李身为中共中央的副主席却只能在沈阳任大军区司令员，失去了在中央工作的权力。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要进一步剥夺李德生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1974年秋冬之际，纪登奎与李先念二人奉命一起找李德生谈话，纪登奎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24〕既然毛泽东发了话，李德生也就不得不“主动辞职”了。李德生向中央提出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最后毛批示：有错改了就好，同意辞去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保留政治局委员。〔25〕李德生成为中共建国以来任职最短的中央副主席——仅一年零四个月。

然而，祸兮福所倚，李德生这次走霉运却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得到补偿，成为李受“四人帮”迫害的明证。文革中被毛看中提拔的人最终都黯然下台，如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吴桂贤等人，惟李德生是个例外，成为文革新贵中唯一一个最终还能“风光离休”的中共大员。1990年，李德生在国防大学政委一职上荣退。

五、几点总结

第一，紧抓军权自始至终贯穿于毛泽东文革运动的整体过程之中，在文革不同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惯用一拨军人取代另一拨军人，以保障文革大业的顺利进行。比如，1965年底以叶剑英、杨成武取代罗瑞卿，1967年1月以郑维山取代杨勇、廖汉生，1967年夏以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1970年庐山会议后又以李德生取代郑维山，林彪事件后再以军委办公会议取代军委办事组。这次毛泽东不过就是故伎重演，以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方式将那些毛心中不太放心的军队将领们调离他们的老巢，而且只调换司令员而不调换政委，这样就一举打散他们多年来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与以前调动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被调换的大军区司令员们没有被打倒，而是易地为官，命运远远好于被打倒的罗瑞卿、杨勇、廖汉生、郑维山，以及黄吴李邱等人。

第二，大力培植文革极左派，使他们逐渐掌握军权，是毛泽东文革中又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介文人，与军队素无渊源，虽然在文革中为毛泽东冲锋陷阵，在打倒刘少奇及其势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九大之后却没有掌握更大的实际权力，他们的活动受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限制。林彪的倒台使得他们有了掌控军队的空间，但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并非十分随顺。比如，江青在1970年就想让张春桥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是却被林彪出面提早一步任命李德生为总政主任，挡住了张春桥。这次毛泽东搞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将李德生赶出北京到沈阳，就是为张春桥腾出总政主任的位置。张春桥遂于1975年1月成为军委常委兼总政治部主任。王洪文则在中共十大后成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年初成为军委常委。这都是毛泽东一步步扶植、重用文革极左派掌控军权的结果。

第三，文革中的“三支两军”使得军队势力膨胀，在“军管”和“支左”的过程中控制了地方政权，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和地方党委大都由军人当政，地方政权高度集中于军队手中。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有感于军队势力尾大不掉，要求军人逐渐淡出地方的党政系统，地方权力交还给地方的党政干部。毛泽东通过对调大军区司令员的方式，不仅将他们调离原有岗位，更不许他们再兼地方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毛泽东实际上以和平的手

段消除了“藩镇割据”、“拥兵自重”的局面。从长远上来说，毛泽东要消除军人有可能形成的对文革大业的阻碍。

第四，军队由于执行毛泽东的“三支两军”的方针政策，难免与地方发生冲突和矛盾，特别是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且往往是支持了“保守派”打击了“造反派”。这就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军人常常受到来自中央的指责。但是，形势比人强，有时为了政权的稳定，在造反派和军队的矛盾冲突中，毛泽东又不能不有所妥协，有选择地支持了军队一方。全国局势稳定之后，军人的作用已然完成，他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退出地方的党政系统，有利于解开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以及造反派之间的复杂矛盾。军队出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一把手的人，或因有人去世更换，如谭甫仁、谢富治，或因林彪事件受牵连而撤换，或因军人调离原职而更换。从1970年底到1975年，至少有十一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一把手由军人改换为地方干部。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也可视为这一环节中的重要一环。

第五，一些地区的领导人调换后，才能在新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贯彻中央的指示，纠正当初执行的某些过激政策，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清除那些被认为属于林彪一系的人马和影响。比如，许世友在南京任职期间，搞了不少冤案，据廖汉生回忆：“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26〕丁盛到任后力所能及地做了平反工作。广州军区被认为是林彪原四野的地盘。许世友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后，为了表功和洗刷自己与林彪的关系，把广州军区原11位党委常委中的8个人打成林彪“死党”予以迫害，后来许世友在广州搞得实在不成样子，中央才出面予以制止。所有这一切都与毛泽东心目中坚持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局息息相关。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8页。

〔2〕《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829页。

〔3〕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

〔4〕李文卿《近看许世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193—194页。

〔5〕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册，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6〕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838页。

〔7〕赤男《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载《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8〕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4页

〔9〕李文卿《近看许世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235—236页。

〔10〕李文卿《近看许世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237—240页。

〔11〕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4页。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2页。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3页。
- (1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7—638页。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5页。
- (16) 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0页。
- (17) 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5页。
-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
- (19) 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59页。
- (20) 邱会作遗稿，丁凯文对程光的访谈。2012年5月13日。
- (21)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400页。
- (22) 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页。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3页。
- (24) 纪坡民《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载《南方周末》，2003年11月6日。
- (25)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03页。
- (26) 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 原载《新史记》总第23期，2014年12月

~~~~~

## 【往事非烟】

### 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

• 李永晖 •

1965年我考取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外语系。离开家乡前，西师外语系毕业生、在我母校四川新都大丰中学任教的刘昌和先生前来道贺，并向我介绍说：西师校园很大，风景很美，师资力量很强，特别是著名学者、诗人、红学家、翻译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吴宓先生在此执教，为西师这所名校平添了一线异色。听了刘先生的这番讲述，我对吴宓先生肃然起敬，决意到校后一定要去拜访他，向他请益。

#### 一、上门向恩师请教

到了西师后，我打探到吴宓先生有一个几成定式的生活习惯，即每天晚饭后都要从居所文化村出来，沿着大操场到三教楼这条路散步，于是便邀约同班同学唐永齐与我一道到大操场边“候驾”，一睹这位泰斗级学者的风采。到了大操场边约摸等候了半个多小时，吴宓先生果然现身了。他七十多岁，个子瘦小，面目清癯，秃顶，戴了副极为普通的眼镜，身着灰色布衫，脚穿圆口布鞋，毫无一点大教授的派头，俨如四川人所称的“糯米老头”。但若细

心观察，也不难发现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散步时左臂挂着拐杖，显得有点洋气。他散步不是慢悠悠的，而是一摇一晃地作细步，走得非常之快，酷似“神行太保”。他走路时双眼直盯路面，决不左顾右盼，精神之专注，有如做学问一般。

入读西师外语系，教授我们汉语言文学的老师是中文系教授杨欣安先生。由于我酷爱中国文学，习作成绩不赖，杨先生挺喜欢我。当与杨先生混得较为熟络以后，我便向杨先生启齿，请他带我去拜访吴宓先生。殊料杨先生以“教务忙”为由，拒绝了我的请求。老夫子毕竟是老夫子，终究经不起我的死搅蛮缠，他最后还是应允了。于是在没隔多久的一天晚上，杨先生便带我去到文化村一舍，见到了我心仪的吴宓先生。吴宓先生的居室不大，只有两间屋子，外住先生，内住保姆。先生所住的这间屋子，陈设极其简单，只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和一把藤椅，看上去显得有些寒碜。杨先生向吴宓先生问安后马上切入“正题”：“这是外语系李生，我的学生，四川新都人。李生对宓公很崇拜，故今夜带他来看望你，向你聆教。”吴宓先生听罢直摆手说：“宓老朽无用，愧不敢当，欣公很有学问，要好好跟欣公学。”说罢转过话锋：“新都乃文昌之地，明代出了个状元叫杨升庵。升庵先生著述等身，是个大学问家，且很有气节，十分了不起。”随即沉吟升庵先生在被流放永昌（今云南保山）途中所著的一首诗：“僧房逢著款冬花，出寺吟行日影斜。十二街头春雪遍，马蹄今去落谁家。”吟罢长叹一声，流露出他与当年升庵先生一样，怀才不遇，满腹愁怅与凄怆。

第二次到先生家是一个冬夜，我向先生请教怎么才能学好文言虚词活用。先生告诉我：“掌握文言虚词活用，其实并不难，只要多读、多记、多用，特别是结合日常生活使用，一定能学好。”旋即以“之”字为例，给我讲授它的若干种用法，并现身造句：“譬如我送你到重庆，我便可说‘吾送李生之重庆’。这里的‘之’是动词，‘去’和‘到’的意思。”这次聆教，我受益匪浅，永生难忘。第三次到先生家是1966年的一个春夜。我将自己写的一篇两千字散文《春到缙云山》送先生批改。先生伏于灯下，将此文细细地看了两遍，然后笑着对我说：“散文难写，短篇散文更难写。这个短篇尚可，如若改用直书和繁体字就更好了。”先生之所以要我使用繁体字，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对使用简化字持有异议使然。那时我太嫩，思想单纯，每去一次先生家回来都要将实情告诉同学。殊料这一“实情告诉”却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出于对我的关心，班里一位“团干”告诫我：“你不是正在争取加入共青团吗？共青团员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吴宓很反动，前年‘四清’运动挨了批，如果你继续和他搅在一起，就会丧失阶级立场，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团干”所说的这番话，着实把我吓坏了，从此我再也不敢去找吴宓先生。不过师恩难忘，我仍经常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先生的情况，关注着先生的命运走向。

## 二、“文革”中惨遭迫害

1966年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延烧到西师，宁静的校园顷刻间沸腾起来。广大师生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运用“大字报、大批判”等方式掀起“革命”狂涛，斗争锋芒直指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和“暗藏”的“叛徒”、“特务”与“历史反革命”。无须分说，吴宓先生首当其冲，难逃一劫。据我所知，中文系“革命小将”给吴宓先生罗织的罪名大抵有这么5条：一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先生主编《学衡》，竟树起拂逆时尚、独领风标的大旗，与鲁迅打笔仗。鲁迅是毛泽东称颂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巨匠和旗手。在“阶级斗争”的框架内，谁与鲁迅叫板谁就是反对鲁迅，反对鲁迅就等于反对党和毛主席。二是在上个世纪举国上下闹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何况”一词的用法时造句说“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先生使用这句话作例句，被说成是“发泄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三是先生授课、写文章，甚至因丢失一串钥匙写一则遗失启

事，皆用繁体字，从不写简化字。简化字是国家颁布的，不写简化字就是“反对党和政府的文字改革”。四是先生经常寄钱给情同兄弟的亡友、著名诗人吴芳吉之子，帮其解决生活困难，不时还周济个别有“政治历史问题”、生活窘迫的教师。于是上纲上线，厚诬先生“拿人民的血汗钱去养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五是爱妻邹兰芳去世后，每逢生辰和忌日，先生吃饭时总得多摆一副碗筷来寄托哀思，有时到北碚街上看电影，还要多买一张票放在自己旁边座位上，以示陪夫人共享欢娱。殊料先生所采用的这些纪念亡妻的方式，竟被说成“迷恋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以上数端“罪行”早在两年前的“四清”运动中就已批过，在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革命小将端出来“炒陈饭”，实属低能和无聊。为了抓“现行”，觅“钢鞭”，中文系革命小将还对吴宓先生实施抄家。可是“战绩”不佳，只从先生床席下面抄出一些用香烟盒纸记的日记，所记内容全属“早餐稀饭一两，馒头两个，鸡卵两枚”之类的生活流水账。“小将”们看了哭笑不得，空着两手，悻悻离去。1966年夏天是革命小将开展“大揭发大批判”的狂热时段。说实在的，此间对吴宓先生的“揭发批判”，据实揭露和据理批判者寥寥，大量的“揪辫子”、“打棍子”，对先生搞人格侮辱和人身摧残。我亲眼目睹了这么一些“批判”场景：一是“群丑亮相”。即将包括吴宓先生在内的全院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暴晒，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二是游街示众。即押着包括吴宓先生在内的全院数十个挂着黑牌、被打入另册的“黑帮分子”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将被呵斥甚至挨打。三是“开小灶”，即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先生。“小将”们一个个登台数落先生“罪行”，台下不时高呼“打倒”、“火烧”之类的口号。尽管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先生总是埋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便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他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看着这位“小将”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于是几位“小将”一拥而上，在一片口号声中将先生拖下台，弄到学校卫生科去包扎。目睹先生惨遭毒打，我不忍心看下去，心头十分难过。

1966年9月，西师对立的两个红卫兵组织开始打派仗，彼此毫无心思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于是其中一派便指派专人将关在“牛棚”里的院系“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赶到校内桃花山劳动改造。斯时外语系“右派分子”向思元先生曾写一首打油诗抒怀，诗曰：“桃花山上牛鬼多，打起黑旗上山坡，你挑粪来我挖窝，大家心头乐呵呵。”的确，对于这数十个“黑帮分子”来说，参加生产劳动总比挨批斗、受皮肉之苦好受得多。在这段时间里，吴宓先生和他的“牛”朋“鬼”友一样，总算喘了口气，过了几天无惊无恐的安宁日子。1967年8月，由于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内斗”升级，山城重庆的“文化大革命”一下子转化为“武化革命”。西师两派相互视为寇仇，兵戎相见，整个校园笼罩着“红色恐怖”，弥漫着血雨腥风。在这种情势下，吴宓先生再也无人管了，他足不出户，蛰居于家中当“寓公”和“书蠹”，每天坐在家除了看书还是看书。1969年秋，根据西师“革委会”安排，中文、教育、物理、音乐等四个系的师生开赴四川梁平县院办农场搞“斗、批、改”。有一次批斗吴宓先生，两名“小将”一人架着先生的一只胳膊跑步拖他上台，途中两名“小将”陡然同时松手，“扑通”一声，一声惨叫，先生跌倒在青石板上，腿骨折断了。我听到这一消息，感到十分迷惘和愤慨。天耶，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竟遭如此迫害摧残，天理何在？国法安在？难道这就叫“革命洗礼”？难道这场“革命”非把先生整死不可？

### 三、奋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圣洁和尊严

1970年，我毕业离开西师，再也未见过吴宓先生。先生后来的情况，我从中文系老师那里零零星星地知道一些。据说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国学界敢于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孔”的人为数不多，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听中文系一位老师讲，有一天系里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有个“造反派”跳起来要吴宓先生批判孔子的“克己复

礼”，殊料这位倔老头子毫无畏惧地站起来高声颂扬孔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思想，并慷慨激昂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道德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永远做不到！”先生的这席话，弄得全场一片哗然，搞得这位“造反派”灰溜溜的，愤愤地骂了声“老顽固，反动透顶”便离开了。类似这样在批判会上“搅局”还有一次：有个“造反派”在批判吴宓先生时骂先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先生听了十分不满，马上站起来：“请问革命同志，这‘不齿’二字是何意思？”“造反派”答：“‘不齿’嘛，就是看不起你这个狗屎堆。”先生听罢大笑起来：“谬矣，大谬矣，这‘不齿’实为‘不与同列’之意。‘齿’，列也。”批判会结束后，有位好心的老师劝说先生何须与这种不学无术之徒咬文嚼字，先生义正辞严地说：“学问大小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辨其真伪，不可让‘不齿’二字谬种流传。”先生的这些表现，有些人觉得“迂古”。若细心考量，我却以为这正是这位老夫子的可贵之处：他矢志不移地追求真理，奋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圣洁和尊严。我的这个说法，并非想当然，在吴宓先生被“造反派”勒令所写《悔过书》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先生在《悔过书》中写道：“宓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宓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同时还写道：“我罪实质是坚持儒道思想为国之本，坚持‘中西融合’的治学理道，坚持中华文化价值所在。宓以为中华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持和发扬光大。”在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中，自身深受迫害、惨遭蹂躏之时，先生竟能置自己荣辱与生死而不顾，始终坚信真理，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这种大智大勇，惊天地，泣鬼神，很值得我们称颂！

#### 四、辞世后享受的哀荣

1977年吴宓先生因患重病，加之右目失明，腿疾困扰，生活不能自理，经亲人请求和本人与校方同意，他戴着“反革命”帽子，由胞妹吴须曼将其带回老家陕西泾阳生活。殊料先生回到老家不到一年，一病沉疴，溘然长逝。据先生的亲人讲，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在弥留之际曾这样呓语：“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是吴宓教授”，使人听了非常寒心和揪心！噩耗传回西师，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和外教研究室的全体教师，在系主任主持下为吴宓先生开了个二十分钟的追悼会。如此草草地打发这位文坛泰斗离开这个世界，全院许多师生愤愤不平。吴宓先生辞世后不久，中国政坛始现开明的政治曙光。1978年8月，西师在东方红图书馆为吴宓先生开了个高规格、像模像样的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来西师还将吴宓先生当年到教学楼上课必经的那条路命名为“吴宓路”，以表示全校师生对先生的景仰和怀念。吴宓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是极为不幸的，但在他死后享受了两个追悼会。这在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不管怎么说，这也算得先生的一种“殊荣”。

近几年，西师中文系徐洪火和刘明华两位教授悉心考证了吴宓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从教生涯。他们称先生“博古通今，尽阅中外”，“在中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很难界定他是哪个学科的专家，而不得不承认他在哪一个学科都是专家”。吴宓先生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成果辉煌，蜚声中外，而且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从1921年执教于东南大学算起，近半个世纪以来，先生先后在全国十二所高校任教，十所高校兼职，多所大学作学术演讲。先生教授的课程有英语语言、翻译技巧和写作，有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有世界历史，有汉语言文学等，共达四十多门，数量十分惊人，为我国培养出大批学有所成的知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及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人才。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曹禺、李健吾、赵瑞蕻、季羨林、李赋宁、赵梦蕻、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吕叔湘、浦江清、贺麟、沈有鼎，以及王佐良、杨周翰、许国璋、许渊冲、何兆武、查良铮、杜运燮、李廷先等都出自先生门下或受过先生教诲。如此一位与陈寅恪和汤用彤并称“剑桥三剑客”的学界名

流，一代宗师，偏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惨遭迫害，备受摧残，晚岁凄凉，郁郁而终。时欤？命欤？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是让人民作答！让历史作答！

引领风标草木知，千红万紫竞称奇。暮年遭遇凌霜节，何奈秋风任所之。2014年是吴宓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草此小文，权表对先生的无比敬重和深切缅怀。

（作者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 原载《世纪》2015年第1期

~~~~~

【书刊评论】

评《王力反思录》

• 阎长贵·王广宇 •

王力1960年开始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1—1964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1964年晋升为中联部副部长，1964年开始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文革中，从1966年4月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到1967年8月底被打倒，王力作为文化大革命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不仅是文革的亲历者、当事人，而且是一个领导者——陶铸倒台后，主管宣传的领导者，因此他关于文革的回忆录理应是很值得重视的，也确实值得重视。

一、披露了若干重要史实和情节

1、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代替中央书记处。现在关于文革的书上，包括最权威的党史书，在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书记处的关系时，不是说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地”代替了书记处，就是说，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代替了中央书记处。按照实际情况，这两个副词即“逐渐地”和“实际上”缺乏根据。实话实说，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要代替中央书记处。不错，中央书记处是毛泽东在八大时建议成立的，并极力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但他决定搞文革的时候，他判定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成了“独立王国”，就决心不要中央书记处了，不再搞中央书记处了，认为他原来即八大时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是一种“失策”，造成“大权旁落”。因而，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陶铸代替彭真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为八届十一中全会追认后，陶铸不止一次地提议“健全中央书记处”，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意愿，实际上，陶铸也没正式地召开过一次书记处会议。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录》中反复说明了这个问题。关于毛泽东要用中央文革代替书记处，他是直言不讳地说过的。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6月以来（按：中央文革小组是1966年5月28日宣告成立的，正好和该年6月相衔接——笔者），代替了中央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0～1481页，着重点为笔者加）九大、十大、十一大都没设书记处，就是毛泽东不要书记处思想的结果和具体表现。

2、林彪主持批判邓小平。这不仅是影响文革进程而且是影响文革后一些重大事情的会议，但对这次会议，历来的文革史书和党史书都付之阙如，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虽然提到了这次会议，也是语焉不详。《王力反思录》比较详实地记述了这次会议。王力说：“十一中全会后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也叫‘生活

会’，新常委都到了，陈云没到。文革小组中部队的几个人没参加，包括刘志坚、谢镗忠。加了萧华、杨成武、叶群。这个会本来没有说批邓。可是江青发起，林彪响应，说主要危险不是刘，刘已被毛主席一张大字报打倒了，现在主要危险是邓。因此这个会变成了刘邓并列。据我了解，这同毛主席原来的设想不一样。会上对刘少奇进行了批评，刘少奇做了检讨。林彪对刘少奇的批评也不那么尖锐，除一般的话外，只是说历史上在苏区你眼里就根本没有我们这些人。（那时刘在苏区具体岗位不高，是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林是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对刘少奇的批评不怎么尖锐，但对邓就讲得很重，特别是把邓同吴晗、彭真、北京市委联系起来，说你一天到晚同吴晗打扑克，打的是政治扑克。吴晗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你的问题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政治性的。意思就是敌我矛盾。总之说得很凶。而且林彪公然提到野战军问题，说你吹嘘你的二野，你搞四卷毛选的注释时没有把各个野战军摆平，突出你的二野。……这次会毛主席要批刘少奇，江青要把刘邓并列，以邓为重点，在江青看来，邓是掌握军队的，是她掌权的障碍。这点江青同林彪一致，林彪并不怎么怕刘少奇，林彪认为能同他争权的不是刘而是邓。邓是淮海战役前委总书记，是指挥两个野战军的。毛主席派抗美援朝的指挥员时，第一考虑是林彪，林彪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去，第二考虑邓小平，但邓小平国内工作离不开，第三才考虑彭德怀。指挥大规模作战，指挥百万大军的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在毛主席看来，这两个人政治上也都很强。我觉得在毛主席心目中，一直是刘邓要分开。毛主席不止一次反复地讲资反路线由刘少奇负责。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常委排次序时把刘往下压了，而邓是往上提的。……刘早就不好分配工作了，只是国家主席的职务没有撤。邓在常委还是有分工的，他管中联部、中调部，还有一个重要的分工是‘彭、罗、陆、杨案’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可是这个会上林彪把邓骂成那样，邓没法工作了。邓当场对康生说，我现在没法工作了，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

“这个会前，叶群跟萧华、杨成武谈话，江青、张春桥跟王任重、王力谈话，动员批邓。江青说刘少奇没什么，一篇大字报就打倒了，最危险的是邓。他在十一中全会上得了全票，在党内还很有影响。这次会要批邓。可是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对邓都不熟悉。江青说，王任重、王力是党的优秀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要发言。张春桥还对我说，主席起初不同意你为文革小组组员，说你是彭真的人，他说这个话是压我批邓。但会上我还是没有发言。为此江青一直恨我。王任重发了言，我认为他是很勉强的，是应付之辞，不痛不痒，他发言时满头大汗，说明他不是出自内心的。萧华、杨成武根据林彪的指示，讲邓讲得多。从邓讲到李井泉，讲到西南局，讲到贺龙，这样毛主席就把这个会停了。”（《王力反思录》，第619～621页。下文只注页码，不注书名）

3、1966年国庆节时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目标指向谁？人们会认为，既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断定是刘少奇提出来的，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指向他了。实际上这样认识并不对。刘少奇也认为，1966年国庆节时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目标不是指向他。1967年4月，刘少奇在回答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批判文章中提出的第八个为什么即“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做了这样的回答：“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完全能够说清楚我为什么犯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说，刘少奇认为1966年国庆节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向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犯这样性质错误的人。那是指向谁呢？对这个问题，王力做了明确的回答。他说：“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已经靠边站，工作组也撤了，为什么还要彻底批判资反路线？这是因为，以前批判资反路线，主要是批十一中全会以前的五十天，就是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的五十天发生的问题，这问题在十一中全会算是解决了。而这次批

资反路线，实际上已经不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而是解决八、九两个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主要是总理、陶铸）以及各省市领导人的问题。毛主席认为他们在这两个月中对路线斗争是不明确的，不坚定的，不彻底的。”又说：“毛主席同陶铸的分歧是九月就已经开始了，九月毛主席就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同志不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刘邓，而‘批判不彻底’，主要是指总理同陶铸。在毛主席看来总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铸。‘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第625、639、656页）我认为，王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4、关于谷牧十五条。所谓谷牧十五条是1966年11月谷牧在陶铸主持召开的全国工交座谈会上所起草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我们看看王力关于“十五条”的说法。他说：安亭事件之前，毛泽东就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大革命，认为光学生不行。他要陈伯达起草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陈伯达和王力搞了一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这个“十二条”提出了工厂要搞文革，认为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其中明白地写道：“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等，但在安亭事件后，这个“十二条”还是显得落后了。该“十二条”交周恩来、陶铸指示余秋里、谷牧召开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谈了20天，普遍认为“十二条”“左”，他们说“十二条”总的精神不对：第一，对工交系统没有正确估计。他们说：“工交战线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第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全面铺开，只能分批分期进行。第三，一定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工厂中不能建立群众组织。禁止学生到工厂串联。工厂要集中力量搞好生产。（第657～658页）在这种情况下和这种基础上，座谈会“十二条”进行了大量修改，实际上基本否定了，他们又搞了与之相对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对这个“十五条”，中央文革小组不满意，毛泽东“不同意”，要求“重写”（第661页）。他叫陈伯达、王力重搞。陈伯达、王力搞出了一个新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

5、陶铸是被谁打倒的？我们看看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怎么说的。陶铸“1966年年底被打倒”。2月6日条目中说：“……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指陈伯达、江青）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按：1967年1月4日，陈伯达、江青在公共场合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笔者），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2月10日条目中说：“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陶铸到底是谁打倒的？在政治局常委中，陶铸位列第四，陈伯达位列第五，一个第五号的常委能打倒第四号的常委吗？江青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怎么能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即便江青和陈伯达联合起来也不行吧。应该说，这是共产党组织原则的一个常识。既然《毛泽东年谱1949—1976》作者已经认定陶铸“1966年年底被打倒”，又记录1967年2月6日和10日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两个人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人们恐怕要问：“1966年年底”陶铸是被谁打倒的？这件事说白了：陶铸1966年年底已被打倒，这是党内机密，而在1967年年初（1月4日）陈伯达、江青二人把这个党内机密向群众公开了——陈伯达、江青犯了“泄露党内机密”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也非同小可，吓得陈伯达要自杀，江青倒跟没事人一样。（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2页注3，第47、50页）这就是《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关于打倒陶铸的一些说法，把责任完全推在陈伯达、江青身上。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直到现在（按：指1991年——笔者），谷牧的回忆录还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好像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按：指毛主席对他起草的“十五条”的态度——笔者），他们到现在还认为陶铸不是毛主席打倒的。（第658页，着重点为笔者加）

——1967年1月8日，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毛主席说陶铸问题很严重，这个人很不老实。“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第678页）

——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我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第696～697页）

——刘、邓已经不能容忍了，陶铸也不能容忍，在毛主席心目中陶铸和彭真一样。（第714页）

——陶铸实际上被打倒，不是（1967年）1月4日，而是1966年12月中央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铸是不是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呢？不违背，也是他的意见。（第778页）

6、关于“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真相。《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说：第二次“大闹怀仁堂”的当夜，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会议》的记录，抢先向毛主席做了汇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89页）这样说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请看王力的说法。他说：“从（1967年）2月下旬到3月下旬，总理主持，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地抽空开批评会。到会人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王力（这是2月16日到会者），新参加者有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谷牧、萧华、杨成武、汪东兴。因为许多人新到会，总理叫王力整理一个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清样由总理和康生审定修改（有档案可查）。总理叫王力先在会上读一遍，核对情况。只有陈老总提出，有一句话他没有讲，要求删掉。总理说，讲是讲了，不要删了。这样就定稿印发了。……这才是现在档案中的《记录》。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第244～245、988页）很显然，这份记录不可能是2月16日“大闹怀仁堂”的“当夜”整理的。

7、关于1967年8月4日毛泽东致江青信。这是一封毛泽东以“润之”名义致江青的信（其内容：武装左派，给左派发枪……），这份文件（或档案及其复印件）很多与党史有关的权威部门不少人看了，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年一生前告诉我，他那里有这封信的复印件，可以去看。我没当回事，一直到他逝世我都没去看，很遗憾。这封极其重要的信《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不收录，有点令人不解。王力说，1967年8月4日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是错误的。其中有两个最大的错误：一是武装左派好像军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没有这封信就没有后来给群众发枪的事。二是群众专政。这两条后患无穷。……更严重的是，主席8月4日的信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要群众搞公检法，私设公堂成了群众专政。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的开头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叫我们都抄下来，贯彻执行。信中还提到夺枪的问题（即群众夺解放军的枪），主席信上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这句话是针对林彪说的，因为林彪刚给他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主席在给江青信的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

形势很好。但是对于林彪提的实质性的问题，如夺枪问题，他就不同意了。主席的这个指示后果太严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的武斗。（第1012～1013页）

一个是所谓反右派扩大化。王力说：反右派，有一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吗？党内搞了那么多右派，文化大革命以后在特殊条件下才彻底平反。最后一个都没有了，只有三个头子，后来，这三个头子也不是了。《开国大典》电影中还有他们，打得那么凶，时间那么长。最后一个都没有了，还说基本正确，只是扩大化的问题。如果基数是九十五，扩大到一百，这叫扩大化，如果基数是零，怎么叫扩大化呢？（第825页）王力20多年前批评反右派“扩大化”的观点，而我们现在还这样宣传，按诸反右派历史事实，这种观点能说得通、站得住吗？

再一个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问题。至今没有看到全国公开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平反，来落实邓小平的指示。（第194～195页）

我们列举了9条事实认为需要引起人们注意，实际上《王力反思录》有意义的内容很多，难以枚举，请广大读者自己努力去发掘吧！

二、若干错讹（包括记忆错误）和值得商榷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也只是举例：

1、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机构建立是1967年7月，而不是8月，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穆欣，而不是王力。

2、关于江青回京时间，不是先于毛泽东，而是后于毛泽东，毛泽东是1966年7月18日，江青是7月20日。（第609页）

3、王力认为他是被江青打倒的。他说，毛主席之所以同意江青打倒他，主要是因为主席相信了江青告他的状：“王力以为‘七二〇’事件后天下不是毛泽东的了，是他王力的了。”（第207、214、280、1019页）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江青能够说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而是他的了吗？聪明和精明的毛泽东能相信江青这种拙劣的状告词吗？毛主席（一）认为王力宣传“揪军内一小撮”搞乱了军队，为了安抚军队；（二）认为王力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的“八七讲话”，搞乱了外交部，影响了国际关系，所以被毛主席作为“替罪羊”“牺牲品”抛了出来。

4、王力说，“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同他无关。（第291页）这不是事实。1967年1月10日，关锋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唐平铸、胡痴，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当晚，江青将这个文件送林彪批阅。林彪第二天批示“完全同意”，使这一口号合法化。（参见《百年潮》2005年第2期余焕椿文）

5、王力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句话来源于刘少奇。”（第612页）这样说，缺乏根据。

6、王力不止一次这样说：“毛主席真心要打倒的，我看一个也没有。”（第681、965页）又说：（毛泽东）“对刘少奇没有看错。”（第724页）这话都是什么意思？按照文革实际，这样说符合历史事实吗？

7、王力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我从来没听他（指毛泽东）说过。”（第696页）这恐怕是王力记忆有误。关锋生前，有一次跟阎长贵说：“毛主席当时（按：指在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家宴上）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徐景贤在《十年一梦》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参见《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8页）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面内战”。唯当时在场并参加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王力说，我从来没听毛主席这样说过。（参见《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注2）

8、王力说：“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第991页）为这件事，2008年戚本禹来北京，我询问了他，他说：我这篇文章不仅毛主席亲自看过、改过，并有批语，周恩来还亲自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我这篇文章逐段地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哪些人的名，怎样点，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对邓小平也没有直接点名，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被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了周扬的名——其实在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早点过了。陈伯达主张点胡乔木的名，康生不同意，陈伯达很坚持，江青支持陈伯达，我听江青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只点姓不点名即写成胡××，这叫半点名。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我提议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周恩来说，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文章一类，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我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我一眼，我觉得江青认为我有害怕的意思，我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我写的，周恩来决定由我署名。还有一点，在这篇文章中质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8个问题，原来没有8个，是我在同林杰、《红旗》杂志责任编辑等共同讨论后增加的。

这就是戚本禹那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写作和发表的大致情况。王力说：“四月一日（按：指戚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时间——笔者），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这不是事实。当我就这件事情直接询问戚本禹时，他惊奇而又有点气愤地说：“王力怎么能够说他不知道呢？！……总理主持讨论这篇文章的会议他是参加了的。真不知道王力为什么这样乱说，这样欺骗人。难道他真的忘记了？！”

9、王力说：“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参见宋永毅光盘所载陈伯达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王力表白他经常在毛主席面前说邓小平的好话，没有说过什么邓小平的坏话。事实果真是这样吗？1967年4月12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刘邓路线问题时，讲到刘少奇“要把我们党变成俱乐部”，王力插话说：“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天天晚上就干。”——他这样说邓，他又表白替邓说话——说好话的事能令人相信吗？我们认为他这是讨好邓小平。邓小平对王力确实也有很高的评价，他1981年12月26日指出，王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的东西：“立场是正确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第4、224、385页）

10、王力说：“我同毛主席天天见面，他天天都有指示，我都传达得很快。”“我天天见到毛主席……”（第917、925页）还说他“经常提醒毛主席”（第211、723页）。——关锋和戚本禹都认为这是王力自吹自擂。

我们就举这几个例子吧。只要认真读《王力反思录》，这类例子还可以发现一些。《王力反思录》虽然有一些这类瑕疵，但我们认为瑕不掩瑜，即不影响《王力反思录》的价值和意义。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4期

~~~~~

#### 【劫后反思】

### 无法抚慰的岁月

• 张抗抗 •

老三届人不喜欢说“我”，总是说“我们”“我们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缺少个性崇尚集体精神。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是长期高度集权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心理。

既然是“我们”，那么我们的过失甚至罪孽，都让“我们”一起承担吧！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倾诉和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一代对于历史的质问，已一次次公之于众；然而，临近20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的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

不要再用“知识青年”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抚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我们应当承认，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缺陷。我们知识沉淀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分，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而是“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条主义，是红宝书的语录，是样板戏的歌词，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文章。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其实还应加上泡饭和咸菜——蛋白质含量太低。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文革”结束后，依靠顽强的自学，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这一代人；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

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还不敢正视自己曾误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社会，便轻易让自己解脱。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的人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并用后半生的善行去赎罪和赔偿；但是有的人，只是怪罪于领袖的鼓噪使他们暂时失去了理性。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曾无私奉献、改天换地；不要再仅仅说我们那年代的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真诚和纯洁。如果你真诚，你应该承认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老三届人中也有出卖和告密——为了入党、升学、招工、提干的极其有限的名额，为了渺茫的前途，我们被人伤害也伤害别人——那所谓的纯真掺杂了多少虚伪和丑陋。我们一腔热血战天斗地，为了那些美好而可笑的宏伟目标，大肆砍树烧荒打猎，那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破坏着自然环境，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还有多少在我们的严厉批斗和打击下丧生的“落后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克己奉公，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支柱力量，是最“优秀的一代”了吧。尽管老三届中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从车间主任到经理到学者到市长，各界都能幸会我们的同学和“战友”。但老三届中，从事高科技、高级经贸活动的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例极小。那是一个人才的断层，是老三届难以攀登的高峰。这一代人几乎都有未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本人即是一例。大多数人只能从事普通的熟练劳动，成为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底座，如今已面临着下岗和退休。

由于共和国十七年教育和“文革”十年的经历局限，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不知不觉地退出社会，离社会的主动脉越来越远。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同市场经济难以相容；我们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适应了“大锅饭”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方式，于是同今天的自由竞争原则产生了剧烈的抵触和冲突。我们已经或即将被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年轻人从头顶上无情地跨越，正在一天天陷入被淘汰的尴尬处境。我们是一只蚕蛹，被困于黑暗中，但我们已无力咬破茧子。我们失落，我们抱怨，而我们却无可奈何，因而我们的痛苦是双重的。

所以，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已担负不起这样崇高而光荣的使命，况且那只是一项虚妄的桂冠。我们曾经有过的革命理想，早就崩溃坍塌了，可惜那仅仅是出于对个人前途和命运的绝望，而不是出于对世界的整体认识。自从失去信仰，我们便从此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的现实主义者。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在这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几十年间，当务之急是吃饭，是工作，是住房，是病痛，是养育子女，是侍奉父母——我们始终在为生存而拼搏，我们早已丧失了选择职业和爱好的自由、机会和能力。“理想”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幻影，所谓的“精神”寄托，只能寄托于我们的子女……

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

这才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老三届人的老三届化，这一代人固执的“老三届情结”，是近年来深深困扰着我的一种忧虑。我写下这些也许触痛老三届人伤痕的文字，正是因为许多人尚在违心地用“无怨无悔”的结语，逃避对自身的清理和整合。我惟愿我们这一代人能走出老三届的阴影，在“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中年，融入改革进步的大潮，从容地迈向二十一世纪。

我们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对得起剩下的岁月？

我们不再是“我们”，我们将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将与老三届一生同行。

□ 原载《爱思想》网站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